

首都博物馆

丛刊

1

1982

421
/:1
509

首都博物馆丛刊

第一辑

首都博物馆

畏、辟亭等。东西两庑现辟为历史文物陈列室。
伟，特为壮观。孔庙院内松柏郁茂葱葱，保存的古迹有：进士题名碑、乾隆石
山东曲阜孔庙，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的主体建筑大成殿，气势雄
二半），明清两代续有重修扩建，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其规模仅次于
——座落在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孔庙内。孔庙创建于元大德六年（公元一三〇

首都博物馆丛刊

· 第一辑 ·

首都博物馆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本辑特约编辑：刘邦烈

开本787×1092 1/16 4.5印张 插页2
字数100,000 工本费：0.65元

· 1982年12月出版 ·



大成殿——孔庙的正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崇台高阶，重檐庑殿顶，饰黄琉璃瓦，建筑雄伟，蔚为壮观。



孔庙鸟瞰——院落三进，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及崇圣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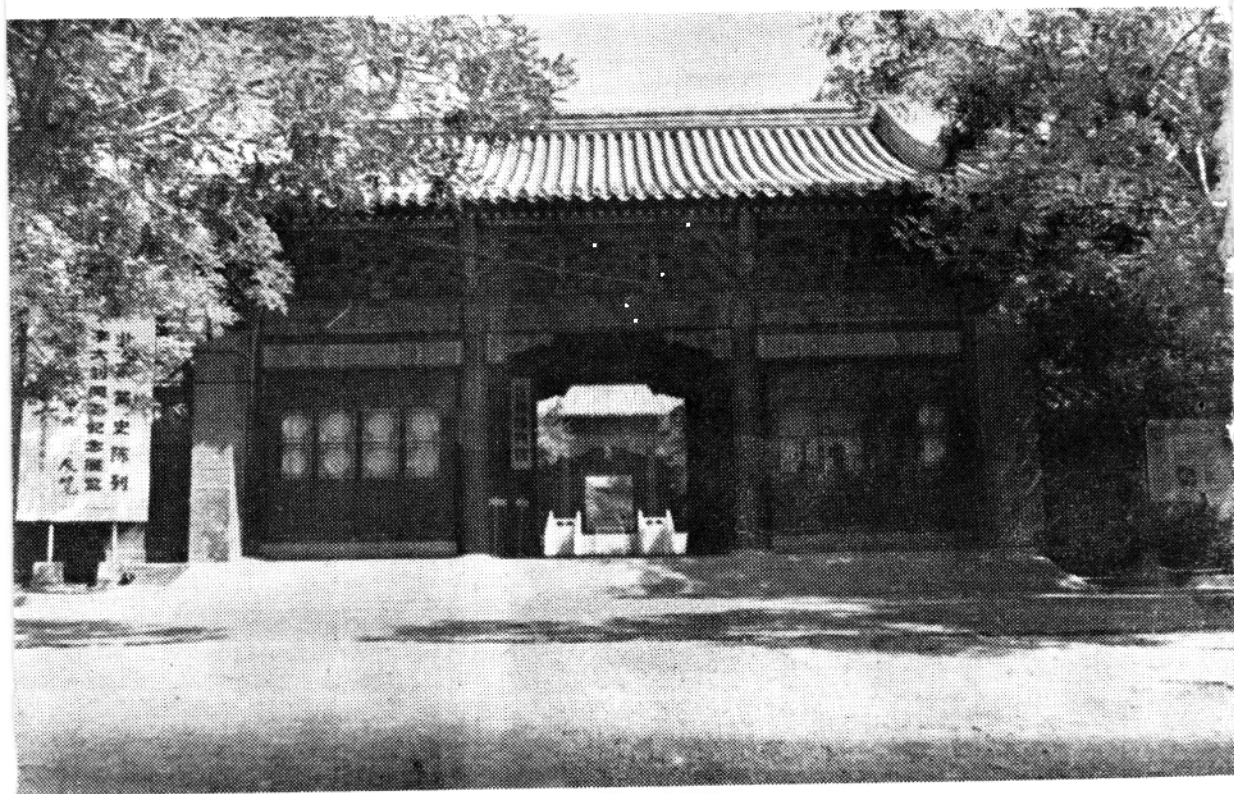


碑亭



大成门——为孔庙二门，崇基石栏，前后三出陛。

朱 芾 摄



先师门——孔庙大门，虽经多次重修，但其斗拱形式仍保持元代风格。

朱 芾 摄

前 言

一九八一年十月，首都博物馆建馆，展出了《北京简史陈列》和《李大钊同志纪念展览》。现在，《首都博物馆丛刊》也和大家见面了。

在博物馆行列中，我们算是最年轻的一员，人手少，工作基础薄弱，缺少经验。正因为年轻，就更需要学习——向兄弟馆学，向专家学，在工作中学，在实践中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园地，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各方面的支持。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它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城郊各地有不少革命先烈的遗迹、遗物；它又是文化古都，历史名城，文物古迹遍布于地上、地下。深入地研究北京地区的古代史、近现代史、革命史，并利用这些实物教材，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成为博物馆工作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丛刊》又为我们交流工作经验提供了方便。

本期刊载了馆内同志十几篇文章，有陈列内容的介绍，有工作中的心得体会，也有专题论述。一方面是向大家汇报学习心得、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汇报，取得各方面的帮助与指导，共同努力，推进我们的工作，为首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目 次

北京历史的再现

- 《北京简史陈列》巡礼……………群 力 (1)
- 从马王堆帛书看纵横家 苏秦……………张 宁 (6)
- 北京历史上的卫星城……………赵其昌 (15)
- 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赵其昌 (11)
- 《辽代汉臣世系表》补正
- 兼论辽金幽燕地区韩延徽族世系……………齐 心 (18)
- 略论耶律楚材的历史功绩……………张 宁 (23)
- 从“滦州兵谏”到“滦州起义”……………梁旭毅 吕乃澄 (29)
- 良 弼 传……………梁旭毅 (40)
- 毛泽东同志与驱张运动
- 驱张运动在北京……………梁志成 (44)
- 共同的理想，战斗的友谊
- 记李大钊、周恩来建党前的交往……………李秀兰 (48)
- 北海阅古楼《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马保山 (50)
- 学习民俗学，抢救民俗文物……………郭子异 (52)
- 《析津志》及其著者熊梦祥……………赵其昌 (55)
- 封面设计：魏 群 摄影：史和平 孙贵奇
-



群 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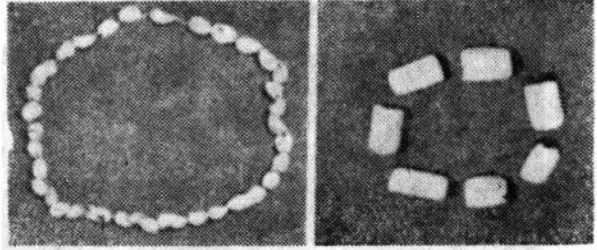
北京，是一座驰名中外的文明古都，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无论是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或是地面上遗存下来的宫阙苑囿，都是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物见证。首都博物馆1981年10月举办的《北京简史陈列》，就是以形象的实物资料为基础而组织出来的一幅北京历史的长卷。它是形象的北京历史，又是北京历史的形象。因此，欲了解北京文明灿烂的历史，循着《北京简史》的序列，作一次别开生面的巡礼，是再好也没有的了。

跨进展室，步入序幕厅，一幅巨大的天安门中轴线照片，形象地突出了北京城今天的发展新貌。它近旁的《北京地理模型图》、《北京城址变迁图》和《北京历代名称简表》等，都可以使观众对北京有个概括的认识。

《北京简史》告诉我们：大约在五十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了远古人类活动的足迹，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北京房山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从展品中的灰烬烧土标本可以看出，这些最古的北京居民，已知道利用天然火种。火不但给他们居住的洞穴带来了温暖和光明，而且又可以使腥膻的食物变得甘美。因此，火的发明和利用，无疑是北京远古居民的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北京人”居住的同一座山的洞穴中，还发现了另外一种人类的文化遗存，这就是距今约五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从展出的刮削器、骨针、穿孔石珠、海蚶壳、鱼骨残骸等遗物，可以看出山顶洞人生活领域的开拓以及向大自然斗争手段的加强。骨针的出现，说明他们已能用兽皮缝制衣裳，而那些经过钻、挖、穿、磨而成的砾石、兽牙、海蚶壳等等，则很可能是山顶洞人创造出的最原始的装饰艺术。显然，山顶洞人已度过了漫长的洪荒岁月，开始步向北京文明历史的大门。

“北京人”和“山顶洞人”，毕竟离我们太远了，那么，在他们之后，居住在北京的先民，又是怎样生活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展出的“东胡林人”和“雪山文化”遗址说起。所谓“东胡林人”，是指1966年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村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它是一

个墓葬遗存，出土的遗物，分别属于两个成年男性和一个少年女性的个体，距今约有一万余年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理少年女性骸骨的过程中，在其项部和腕部发现了用螺壳制作而成的项链和牛肋骨磨制而成的手镯。鉴于东胡林人的遗骸和遗物，不是发现在山洞中，而是在平原的黄土台地上，说明东胡林人可能已离开祖居的山洞，而迁徙到平原上居住。所谓“雪山文化”，就是指1961年在北京昌平雪山村发现的文化堆积。“雪山文化”包括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其中第一层和第二层，分别属于我国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范畴。据研究，六七千年以前，生活在北京的人类，可能就是雪山一期文化的创造者。



螺壳项链、骨手镯(新石器时代)

展品中的敛口钵、双耳敞口罐等，就是他们当时的生活器皿。雪山文化二期距今约四千余年，展品中的磨光黑衣灰陶双耳罐、折腹盆、褐陶绳纹鬲等，当是他们创造的文化遗物。至于雪山三期文化，鉴于它的分布范围，与西周燕国的版图大致相当，它可能属于广泛分布于密云、平谷以及河北东北部、东北三省一些地区的“夏家店文化”。事实证明，这时的北京历史，已经跨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

在醒目的“燕蓟遗迹”标题下，简史把我们引入北京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历史——奴隶社会。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前十一世纪，我国商代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北京商代的历史，史籍无征，过去一直是个空白。自从平谷县刘家河商代墓发掘之后，才多少弥补了人们对商代北京历史的茫然无知。展品中的三羊纹铜鬲、铁刃铜钺等珍贵文物，就是北京商代灿烂文化的实物见证。到了西周，关于北京的历史，在《礼记》和《史记》等史书上均有了明确的记载。《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奭于北燕。”北燕，即指现在的北京。然而丰富多彩的商代北京历史，凭此只言片语的记载，实在是远为不够的，再加上后人对此又有各不相同的解释，因此，关于西周二百多年的燕国历史，遂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公案。《北京简史陈列》，以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商周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初步揭示了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原来，琉璃河商周遗址，不仅发现了匭（古燕字）侯王族的墓地，而且还发现了匭侯赖以统治臣民的城址，许多带有“匭侯”铭文的青铜彝器，如“匭鼎”、“匭盃”、“匭尊”等，作为历史的见证，更记录了当年燕国历史的情况。其中的匭鼎，通高62公分，重41.5公斤，造型浑厚，纹饰古朴，内铸铭文26字。大意是说，匭侯派匭到宗周（镐京）向大保贡奉食品而受赏赐的事。按“大保”即召公奭，匭侯即召公的长子，说明召公事实上并未到燕地，而是一直留在宗周，辅佐周室，让自己的长子代掌他的燕侯之职。也就是说，第一代燕侯，并不是司马迁《史



三羊纹铜鬲(高)

记》上所指的召公奭，而应是他的长子。这一燕国史实，在琉璃河商周遗址发掘之前，显然是难以弄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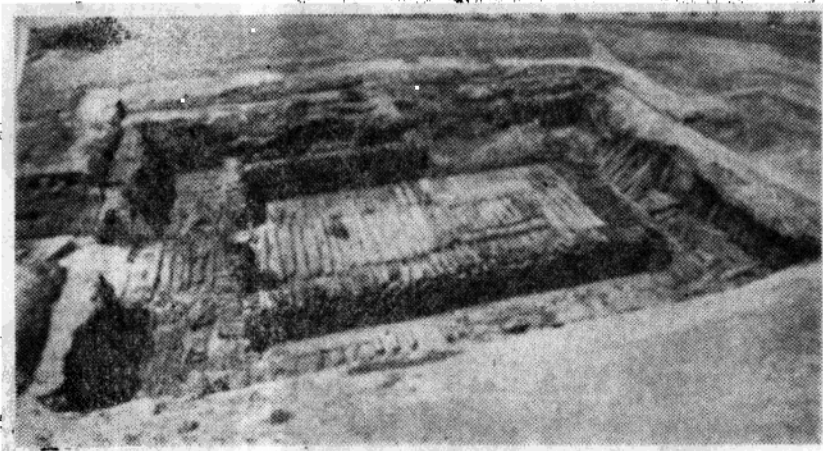
到了春秋战国，燕国崛起，争霸中原，号称“七雄”之一。根据文献记载，燕国的都城设在蓟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不过关于蓟城的具体方位，历来有不同看法，传统的说法是在今广安门以西的白云观蓟丘一带，但近年蓟丘的发掘证明，在蓟丘古城的城址下，却发现了四座东汉墓，因此判定蓟丘古城的上限最早不能早于东汉，所以对传统蓟丘的方位又提出了新的疑义。对于这一有争议的学术问题，限于证据仍不充分，《北京简史陈列》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客观地把北京出土的有关文物，如陶井的分布，燕国饕餮纹半瓦当的发现，以及碑刻墓志上的有关蓟城方位的记载等等，如实地在陈列中加以表现，以便为最终寻觅蓟城的城址方位，提供一些研究素材和线索。

从秦汉到隋唐，一千多年间，北京地区呈现出动荡不定的情势，有时它作为统一王朝的北方重镇，有时又作为民族融合的聚点、军阀割据的要地。为了表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北京历史，陈列一方面注重反映



饕餮纹半瓦当
(战国)

了北京当时的战略地位，如北京唐代悯忠寺（今法源寺）及其遗物，就是这方面有力的见证；同时对于处在分裂割据局面下的幽燕人民，在艰难的社会条件下，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社会财富、推动历史发展的功绩，也予以充分的歌颂和肯定。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规模宏大的西汉“黄肠题凑”的墓穴模型，学术价值很高的汉代石阙（拓片），富有生活气息的汉代陶楼、陶灶、陶制禽兽等文物。唐代的“安史之乱”曾给唐代社会造成空前浩劫，幽州（唐代北京称幽州）作为这一叛乱的发难地，良乡林家坟发现的史思明墓及其出土的玉册、铜牛、鎏金马蹬等文物，为我们了解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北京地区隋唐以前一千多年的文明史，数以百计的文物，《北京简史陈列》只能做简要的介绍。而在这之后，辽、金、元时代的北京历史则更具地方特色。契丹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自五



“黄肠题凑”墓穴——大葆台一号汉墓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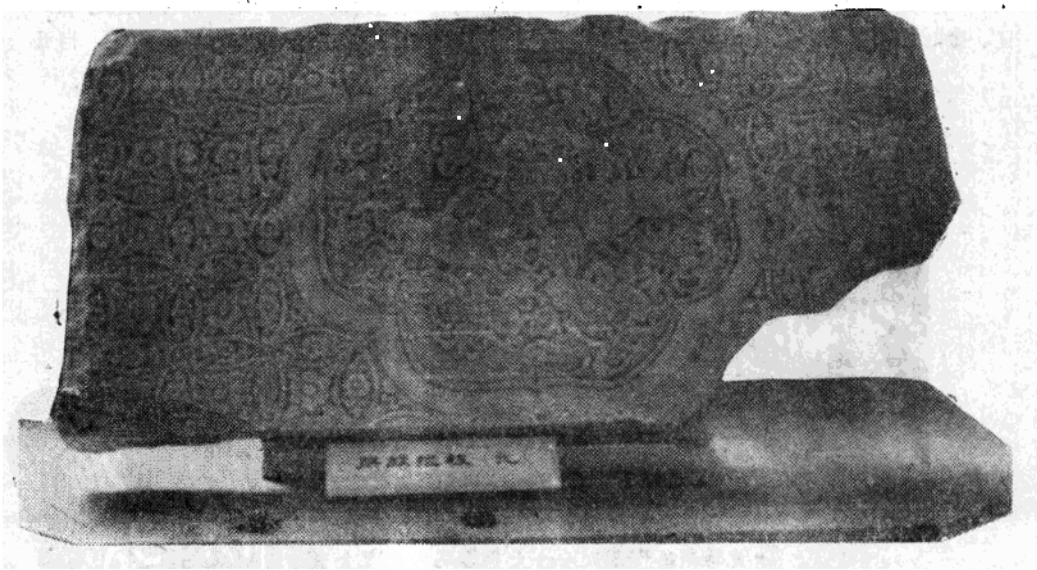
代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以后，契丹即于公元938年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作为陪都，并于947年改国号为辽。宋金联合灭辽以后，幽州又一度归属北宋，称为燕山府。金灭北宋后，金主完颜亮于1153年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到了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力图统一中国。为了“南临中土，控御四方”，忽必烈遂于1260年诏示中外，迁都燕京，定名大都。并于公元1271年（至元八年）将国号改为“元”。元朝政权在大都的确立，标志着北京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历史的开端。



鎏金面具（辽）

《北京简史陈列》，对于辽金时代北京的历史，着重从城址展拓、政治经济生活、民族文化融合等方面进行了反映。这里展出的有辽赵德钧墓出土的文物和壁画，有象征统治权柄的官方印玺，有反映辽金时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铁制农具以及独具民族风格的辽代陶瓷马蹬壶、鎏金面具等。金代“官”字款石虎和冶铸水平很高的“金泰和八年”款铁狮等，还都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金代大定年间开始兴建的卢沟桥，更以其精湛的石雕艺术，为世人所称道。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契丹、女真民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都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在陈列室的中部，一块巨大的大理石浮雕栏板，引起了不少观众的赞许。这块长方形栏板，长1.60米，宽0.80米，上面雕琢的是两个腾跃的麒麟形象。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具龙头、狮尾、鹿角、牛蹄，遍体鳞甲，姿态凶猛，是祥瑞的象征。这件栏板的构图，上部为翻滚的云雾，下部为咆哮的海潮，既雄壮又多少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看到这气势不凡的建筑构件，使人自然会联想到以雄伟壮观著称于世的元大都来。



石雕栏板（元）

朱芾摄

元大都是十三世纪闻名世界的城市。它位于辽金北京故城的东北方。简史陈列对元大都发掘出土的许多文物，作了重点展出。有印章、衡器、和义门瓮城遗物、后英房民居遗址以及反映大都建筑的陶石琉璃建筑构件等。所有这都可以使观众通过直观认识，加强对元大都的了解。在元大都陶瓷艺术的展柜中，展出的一组元代陶瓷名窑精品，特别吸引观众。不少观众，在欣赏之余，还不时发出咄咄的赞叹声。在这组展品中，造型浑厚、略略大方的青花荷叶大盖罐，是元代景德镇瓷业工人的杰作。釉彩斑驳、造型别致的钧釉双耳连座瓶，则属罕见的元代钧窑产品。至于典雅小巧、纹饰生动的青花凤纹扁壶，更是不可多得的元代青



青花凤纹扁壶（元）

花瓷器的精品。侧身于扁壶身旁的镂空琉璃三彩龙凤炉，尤其出类拔萃。炉的腹部展翅回首的飞凤，腾翔于枝叶茂盛的牡丹花卉之中，炉盖上层峦叠嶂，岫岩突起，一条黄龙昂首盘绕在峰峦之中，这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制作工艺，显示了元代陶瓷匠师们非凡的艺术造诣。

继元之后，明清王朝又先后在北京建都。由于这两个王朝时代较晚，过去举办的展览，一般都不作重点表现。这次《北京简史陈列》，为了使观众对北京的历史发展有个较为系统的了解，故在陈列的分量上，也给

予了应有的注意。在陈列的内容上，除对明清两代北京城的改建增拓，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业绩，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等历史事实，尽可能地作了形象反映之外，对于明代的特务政治——厂卫机构，明清两代的学校和科举制度，都作了重点的表现。观众除了能看到特务机构使用的锦衣卫牙牌、东厂关防以外，还可以直接看到当年科举入试的试卷、入试图等。如果兴致未尽，还不妨根据这些展品的线索，到孔庙前院去浏览一下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的风采。从那里可以看到当年应试中第的进士姓名和籍贯。如果说，当年金榜题名旨在显亲耀祖的话，那么在今天，它却成为我们研究科举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饶有趣味的是，在光绪三十年末榜进士的题名碑上，还镌刻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老先生的名字。

在靠近明代神威大将军铜炮处，一个坡面柜中展出的几枚银币，尽管它不象高达2米有余的清代将军盔甲那样雄伟，也不象其周围陈列的明清瓷器、景泰蓝、文房四宝那样绚丽多姿，可是他的历史价值却一点不因貌不惊人而稍减，相反，它却以特有的身份而显示出其历史价值。比如那枚铸有“大清台湾军饷”字样的银币，无疑就是清初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祖国宝岛台湾以后的遗物。

巡礼到此似乎可以结束了，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巡礼所记只是陈列内容的大概，限于篇幅和水平，轻重失宜，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更何况陈列本身还在进一步充实中。我们的目的和愿望是：经过不断的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为广大观众提供一个有北京鲜明的地方特色的、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的北京历史陈列来。

从马王堆帛书

看纵横家苏秦

· 张 宁 ·

苏秦是战国时代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先秦古籍对他的记载，多不可靠，真伪难辨。司马迁在《史记·苏秦传》中指出：

“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可见远在司马迁为其作传时，已对传闻中的苏秦事迹作了一番去伪存真、甄别取舍的制作功夫。可是由于他当时未能更多地接触到有关苏秦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在《史记》中叙述的苏秦事迹，仍不免存在着许多错误，他的“毋令苏秦独蒙恶声”的良好愿望，并未能完全实现。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①（以下简称“帛书”），保存了许多被埋没了两千多年的真实可信的苏秦史料。在27章帛书中，有关苏氏的资料多达16章，除了第20到22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以外，其他各章都是不曾见过的新资料。这些苏秦自各国献给燕昭王、齐闵王等国君的私人信件和说词，是苏秦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其史料价值之大，足以使古籍中的苏秦形象为之改观。尽管帛书编排失序，有些文句也因残缺不使得其读，但经史学家考订校勘之后，其脉络和事实已基本弄清，因此它仍不失为目前研究苏秦的重要文献。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就苏秦与燕国的历史关

系，试对苏秦的主要生平事迹、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一）

燕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国都蓟，即现在的北京。苏秦与燕国历史发生关系，实际上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燕昭王时代（前311—前297年）。《史记》等古籍多把公元前三世纪初到前二世纪末的苏秦的事迹，提前到公元前四世纪末，而把真正属于苏秦的事迹误记在苏代、苏厉等人名下，不但把本不是同一时期的张仪、苏秦同列为连横合纵说的倡始人，而且还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并把苏秦之死，错定在张仪卒年之前。时序既差，更由此而派生出其他许多错误。《说苑·君道》云，燕昭王师事郭隗三年后“苏子闻之，从周至燕……”。这里的苏子，究系何人，如果依据旧说，当然不可能是指苏秦，因为根据那种错误的记载，燕昭王即位后的苏秦，早该不在人间，焉有人鬼相遇之理！现在当我们真正弄清了苏秦的生平之后，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里的苏子，当即苏秦。燕昭王即位于危难之秋，当时燕国面临的形势是：“齐人攻燕，拔故国，杀子之，燕人不割而故国复反（返）。”（帛书15）为了

^①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复兴燕国，图谋报强齐之仇，新即位的燕昭王，师事燕国名士郭隗，筑黄金台招纳四方贤士。由此可见，苏秦正是慕燕昭王的“纳贤”之名，从东周洛阳来到了燕国。

苏秦作为燕国的使臣到齐国活动，是在齐宣王时代（公元前319年—前301年），但在公元前296年以前，也就是说在齐相孟尝君执政时，苏秦在齐国并不掌实际权力，因此不太可能有多大作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他于公元前307年，利用齐伐燕后各国欲“伐齐存燕”的历史条件，游说齐宣王“归燕十城”。由于有人在燕昭王面前说他的坏话，所以当苏秦自齐归燕时，受到燕昭王的冷遇。帛书5的“谓燕王曰”就是苏秦此时面陈燕王的说词。苏秦针对燕昭王的怀疑，列举了许多诸如“孝如曾参”、“信如尾生”的历史典故，说明忠信获罪的道理，力劝燕昭王摒弃“自覆之术”，而取“进取之道”。苏秦的这席话，使燕昭王对他的前疑冰释，并进一步博得了燕昭王的信任，这就为日后苏秦受命“治齐燕之交”——为燕间齐奠定了基础。

在苏秦使齐“治齐燕之交”以前，燕齐之间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公元前296年，齐燕发生的“权”之战^①“覆三军、杀二将”，燕国再次遭到失败。二是公元前293年，燕派将军张廉助齐伐宋，被齐国所杀。前者使燕国实力消耗殆尽，更无力与齐抗衡，后者使燕国蒙受耻辱，进一步激起燕国义愤，在齐强燕弱的情况下“齐杀张廉”虽然以燕昭王“择人不谨”的屈辱条件而告终，但这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隐忍待时的策略。这便是苏秦治齐燕之交的时代背景。

所谓“治齐燕之交”就是要苏秦打入齐国内部，表面处理好燕齐关系，而背地里则千方百计离间齐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孤立齐国，以创造破齐条件。苏秦认为，燕齐之间，积怨久深，他到齐，难免受到怀疑，但如果设法使自己“循用于齐”，他就可以“大者可以使齐毋谋燕，次可以恶齐勺（赵）之交，以便王之大事，……”（帛书4）。那么，苏秦是怎样“循用于齐”呢？换句话说，有没有“循用于齐”的客观条件呢？这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齐国的形势。自公元前317年齐宣王伐燕以后，齐国与三晋特别是赵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今南方之事齐者多故矣，是王有忧也，臣何可以不亟来”（帛书4）。这里说明，一、齐宣王正在为南方诸国对齐的变故而担忧，二、苏秦表示自己可以帮助齐国排解困难。此书是苏秦自燕献给齐闵王的信，从内容分析，齐闵王很可能是对苏秦表示了邀请，因此苏秦才能在信中说，他即使不受燕国所使，自己也会坚决来齐，那怕是为此得罪燕国，也在所不惜。为了进一步取得齐闵王的信任，苏秦还自比管仲，举出“贱不能临贵”的典故^②，要齐闵王对他委以重任，待以上卿之礼，以便于他的用事。齐国处于多事之秋，对苏秦的要求，只得接受。其次，公元前294年，齐国发生了“田甲劫王”事件^③，由此齐闵王与齐相薛公田文（即孟尝君）的关系，开始恶化，薛公罢相之后，第二年齐闵王发动伐宋战争，二者关系更加恶化，结果薛公田文去齐相魏，齐闵王则开始亲自执政。新任齐相韩贲，想借苏秦争取燕国，联合韩、魏，压服赵国，从而乘机灭宋。看来在苏秦入齐

① 据徐中舒先生考证：“权”之战，发生在今河北省完县西北。详见《历史研究》1964年1期《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

② 《说苑·尊贤》：“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公以为上卿。’”

③ 公元前294年，孟尝君田文指使一个叫田甲的贵族，谋杀齐闵王，没有得逞。自此齐闵王与田文关系开始恶化，孟尝君田文之薛，齐闵王开始亲自执政。此事史称“田甲劫王”。

以前，韩、苏之间当早有契约，二者的动机不同，实际上是互相利用，苏秦要求韩、冀，如果他能以齐国的大国地位，来抬高苏秦的身份，他则可以担保燕国服从齐国。如此“齐燕为一，乾（韩）梁（梁）必从。勺（赵）悍则伐之，愿则挚（执）而功（攻）宋”（帛书8）。这个密约在苏秦入齐以前，当已谈妥，因此，当后来大队车马簇拥苏秦，浩浩荡荡由燕入齐时，齐国才会给他以隆重的接待。齐相韩、冀，甚至还殷勤地迎出临淄城门外，亲自为苏秦驾驭车辆，将苏秦迎入邸舍。总之，苏秦为燕入齐反间，显然是颇费了一番心计的，“无不以口齐王而得用焉”当是苏秦的由衷之言。

燕昭王对苏秦入齐“治齐燕之交”看得很重，当苏秦对其使命有所疑虑时，燕昭王认为，“不之齐，危国”，力劝苏秦强行其难，而当苏秦解除疑虑之后，也就下决心“以死之围，治齐燕之交”。

苏秦入齐两年以后，出齐相魏的薛公田文，利用齐伐宋引起各国对齐国的不满情绪，策划秦魏燕赵诸国反攻齐国，其中的燕国，本来是齐伐宋的随从，但由于不甘心齐杀张廩的凌辱，又轻信了田代、参去疾之言，决心伐齐复仇。不料亲齐派赵相奉阳君李兑，为了实现齐伐宋后答应给自己的好处，即所谓“定其封于齐”^①，竟把这一秘密的策划活动，透漏给了齐闵王。还说，几国谋齐，罪责主要在燕国。燕昭王慌了，指令苏秦设法从中周旋。燕国的这一谋齐活动，“使齐大戒而不信燕”，苏秦为此曾提出辞呈，只是由于燕昭王的震怒而只好作罢。苏秦先是竭力为燕开脱，要齐闵王不要轻信谣言，进而向齐闵王保证，如果燕国真

有谋齐之举，他也一定会冒死劝阻，劝阻无效，起码也会把消息事先报告齐国。从帛书3的内容上看，苏秦的这一游说，似对齐闵王发生了作用，不然的话，齐王焉能把李兑“罪燕”一事，原封转告于苏秦？应该说，苏秦此举收到了一箭双雕的妙用，不但使齐闵王对燕国谋齐事表示“弗信”免除了燕国的一次危机，而且还使齐闵王对苏秦更加深信，以致“封而相之”。

苏秦“治齐燕之交”的另一任务是破坏齐赵之间的联盟关系，赵当时是仅次于秦、齐的强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苏秦看来“齐赵不恶，国不可得而安，功不可得而成”。帛书1、2都记有苏秦被拘于赵的事实。奉阳君李兑等人，为什么把苏秦拘留在赵，既不让他到齐国，也不让他到韩、魏，其原因，帛书上虽缺乏明确的反映，但苏秦自赵献书燕王的信中曾称，“臣之所患，齐勺（赵）之恶日益，奉阳君尽以为臣罪”，足见苏秦的被拘，显然与他离间齐赵大有关系。

公元前285年，秦国为了拉拢齐国，派穰侯魏冉到齐国致帝：秦昭王称西帝，尊齐闵王为东帝。齐秦并帝是秦国连横方针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是相约伐赵，三分赵地。齐秦并帝，不利于燕，苏秦竭力反对。他怂恿齐闵王说“伐赵不如伐宋之利”，为了使“天下爱齐而憎秦”，力劝齐闵王“攻秦去帝”合纵抗秦。苏秦此时所以主张齐伐宋，显然是出于破齐的战略考虑，因为齐攻宋大有利于燕。燕在齐北，宋在齐南，齐南攻宋则必然减轻北部对燕国的压力，此其利一；楚、魏均与宋接壤，齐攻宋则楚、魏必然来争地，势必与齐发生矛盾，此其利二；此时秦国竭力保护宋国，齐攻宋必然与秦发生冲

^① 公元前290年齐伐宋，齐闵王允于成功之后把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西北）给李兑作为封地，以此来换取赵对齐伐宋的支持。

突，此其利三。所以苏秦极力引诱齐闵王伐宋，以造成齐国四面树敌的孤立地位。尽管齐相韩贲对伐宋持反对态度，齐闵王还是听信了苏秦的话，于是秦齐并帝伐赵的局面，遂一变而为“齐赵会于阿”的合纵抗秦的态势。结果并帝不久，秦便不得不“废帝请服”，还被迫退还了过去侵占邻国的一些土地。帛书21云：“且五国之主尝合衡（横）谋伐赵，疏分赵壤，著之饭（盘）筭（盂），属之祝诅（籍），五国出兵有日矣。齐乃西师以喻（禁）强秦。”这正是当时急剧变化形势的真实反映。齐、魏、燕、韩、赵五国合纵抗秦，在名义上虽是以赵相奉阳君李兑为号召，但实际组织者却是苏秦。所谓“请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传焚符之约者臣也，欲使五国约闭秦关者臣也”（《战国策·魏策二》），这是苏秦的自白，应该是可信的。

五国合纵抗秦，由于同床异梦，各有打算，尤其是齐国，只不过是借合纵抗秦之机，乘机灭宋，因此西进的联军只是在河南荥阳成皋逗留数月，便无功而还。公元前287年，齐遂发动了第二次伐宋战争。如前所说，宋国既然是极为敏感的矛盾中心，齐国带头破坏合纵而伐宋，就不能不引起其他国的愤慨。此时的燕国，复仇心切，便串通他国，想乘齐宋交战之际，袭击齐国。由于燕昭王谋事不密，被齐闵王察觉，他便立即派宋穷、侯嬴二人，把这一情报告诉身在魏国的苏秦，说“寡人与子谋功（攻）宋，寡人持燕勺（赵）也。今燕王与群臣谋破齐于宋而功（攻）齐，甚急……”。基于这种形势，他决定不管伐宋战争进展如何，务于八月收兵（帛书6）。从此章篇名“自梁（梁）献书于燕王”可知，此书必是苏秦得知此消息之后从魏国发给燕昭王的急件。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苏秦的目的在于通知燕国，在齐有备的情况下，万勿贸然行事，苏秦认为，此时伐齐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他劝

燕昭王“足下虽怒于齐，请养之以便事”。苏秦还很担心自己的间齐活动被发现，在信中一再嘱咐燕昭王勿将此事轻易示人，否则“天下之欲伤燕者与群臣之欲害臣者，将成之”。在信的末尾，他还要燕昭王禁止臣属再议谋齐之事，并请燕昭王放心，说根据他的观察，齐国目前尚不能也不敢轻易进犯燕国，在他处理完燕赵之间的关系之后，他将会派人到齐国窥测事态，以便随时再向燕昭王报告。

苏秦治齐燕之交是颇不容易的，在积有深仇互不信任的齐燕两国之间相周旋，既要取用于齐为燕反间，又要取得燕昭王对他的谅解，这本身就增加了其任务的难度。“臣贵于齐，燕大夫将不信臣。臣贱，将轻臣。臣用，将多望于臣。齐有不善，将归罪于臣。天下不功（攻）齐，将曰：善于齐谋。天下功（攻）齐，将欲齐兼弃臣。臣之所处者重卵也。”（帛书4），这的确是苏秦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事实上也确如此，尽管他治齐燕之交，颇有成效，几年之内，使“齐兵数出，未尝谋燕”，而且由于他诱使齐攻宋，遂造成“齐之信燕，至于虚北地行其甲”但还是不能为人谅解，齐闵王对他有“过辞”，燕昭王也对他表示狐疑，准备撤换他，齐国的责怪不难理解，燕昭王的怀疑则使他深感委屈。帛书4中，苏秦用了很大的篇幅，追溯了他治燕齐之交的经过，列举了他治燕齐之交的成绩，其目的就是用具体事实来表明自己的忠心。

公元前286年，齐对宋发动了第三次战争，燕国也“奉齐助之伐宋”。由于此时宋国内乱，终于被齐国所灭。齐灭宋后，独自兼并了宋以前所取得的楚淮北地，一时声威大振，这就直接威胁了三晋和楚国的安全。秦国也感到不安，由于齐国反复无常，“齐先鬻勺（赵）以取秦，后卖秦以取勺（赵）而功（攻）宋，今有（又）鬻天下以取秦”

(帛书7),结果就使自己完全孤立。苏秦对这一情况当然很清楚。因此,他便毫不迟疑地秘密写信给燕昭王:“臣闻齐赵、齐赵已孤也,王何不出兵以攻齐。”可以看出,所以出现如此有利的破齐条件,苏秦在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燕昭王得此消息以后,即联络赵魏诸国,以燕将乐毅为统帅“轻骑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史记·乐毅列传》)。乐毅伐齐的空前大胜利,是战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古籍对此事的记载多不详备,特别是对苏秦在其中的作用,失载,竟至造成乐毅伐齐与苏秦毫无关系,殊不知如果没有苏秦在治燕齐之交过程中的作用,其胜利就是不可能的。帛书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苏秦不但在破齐中,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还为此献出了生命。“苏秦封武安侯而相燕,即阴与燕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而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战国策·楚策》)。对照帛书内容,这里记载的苏秦致死的原因,当是可信的。

(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秦自公元前308年入燕到前284年在齐以反间罪被处死,二十多年间,其主要活动就是为燕反间。为此,他频繁地奔走于燕、魏、齐、赵等国之间。在变化莫测、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始终不渝地履行燕昭王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尽管他在治齐燕之交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困难和艰险,直到最后以反间罪被齐闵王处死,都未能动摇他对燕昭王的忠心。苏秦所以如此,除了燕昭王礼贤下士政策感召以外,应该说还有反对大欺小、强凌弱的正义感在。

苏秦的这些事迹和精神,过去古籍鲜见记载,而《史记》、《战国策》等文献上的

记载,又每每多是“异时事皆附之苏秦”的拟说。根据这些不尽可靠的材料所描绘出的苏秦形象,就难免与历史事实相矛盾。有的任意夸大其作用。“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诸侯之威,谋臣之权,皆决于苏秦之策。……夫贤人在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战国策·秦策一》)。战国时代,“七雄”之间,“一合一离,互争雄长”,从来就没有因一人的作用而天下从的局面,苏秦也决没有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有的是出于杜撰,诸如人们所熟知的头悬梁、锥刺骨、挂六国相印、锦衣还乡之类,其内容虽然娓娓动听,但其真实性实属可疑。有的是对苏秦的形象作了曲解,认为他是反复小人,是不忠于人君的“态臣”。凡此种种,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古籍中关于苏秦这些真伪混杂的记载,过去虽经不少学者考订校勘,但在帛书出土以前,许多问题终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结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可以使我们根据苏秦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对以往古籍中的苏秦事迹加以比较和印证,从而使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真正苏秦。帛书的记载表明,苏秦在战国时代的历史舞台上,实系一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战国时代的燕国“北迫蛮夷,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史记·乐毅列传》)。自从乐毅破齐以后,由于齐国一蹶不振,遂造成秦国独强的局面,而合纵和连横之间的战争,至此也就凝成一个定型,无论连横或合纵,都是以秦国为一方,而以其他六国为另一方,直到秦国最后兼并六国统一中国以前,这一格局,终无改变。苏秦在促成这一形势的变化过程中,应该说起了相当的作用。帛书中苏秦史料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苏秦乃至我国先秦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